

从科学的春天走来

——科技体制改革回顾(上)

本报记者 唐婷

经历过严冬的人,更容易感受到春天的温暖。40年前的那个春天,对科技工作者而言,尤为不同。他们中的很多人,在那一刻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

1978年3月某日的上午,徐匡迪正带着工农兵学员在上海第五钢铁厂进行炉前劳动。突然,

喇叭里传来声音,让他去厂部办公区一趟。当时,他的身份是上海工业大学一名工作了近20年的助教。

到厂办后,他被通知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这个会议就是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,后来其被视作“科学春天”的序幕。

40年后,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《中国科学院院刊》采访时曾说:“像我一样的中国千万知识分子,在科学的春天里,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。在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,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机遇,努力学习和工作,大展身手,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‘知识报国’的理想信念。”

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

尊重知识、崇尚科学,现在看来已是常识。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,当邓小平同志提出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这两个论断时,不啻为一声春雷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,知识分子的地位处于“左右”摇摆的状态。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间,这一问题更是愈演愈烈。对此,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、中科院院士赵忠贤有着切身体会。在一次座谈会上,他曾回忆过自己在“文革”时的遭遇。那时,他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一项国防任务。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辛苦,但他依旧努力完成。可在和别人因工作的问题而发生矛盾

后,竟被骂“你个臭知识分子!”

那十年,科技领域成了重灾区,我国的科技体系和组织体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党中央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,这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。如何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问题又摆上议事日程。在这种背景下,为了更好地凝聚人心,鼓舞士气,于是有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。

“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,‘四个现代化,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’,把科学技术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。这次大会的召开,标志着我国科技领域开始全

面复苏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表示。

在科学的春天里,我国广大知识分子,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开始摆脱精神的枷锁,迎来政治上的翻身解放。为了彻底清除长期“左”倾错误的严重影响,1978年11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了《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》。

该意见要求,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。其内容包括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;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冤、假、错案工作;要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、放手使用;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。

从恢复元气到提出“面向、依靠”方针

不仅为知识分子“脱帽加冕”,全国科学大会还审议通过了《1978—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八年科技规划》),勾勒出一幅奋斗蓝图。

1978年以前,我国继承了苏联计划式的科技发展体系。在这一体系中,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国防科研是相互独立的结构单位,通过计划手段来组织协调科技项目,实施技术转移。

随着国家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方向转移,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也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调整。1980年12月,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(以下简称国家科委)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,会议肯定

了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国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,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,主要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。

紧随其后,“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,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”的战略指导方针(简称“面向、依靠”方针)在1982年被提出。在这一方针指引下,国务院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,从宏观和战略层面统领全国科技工作;对科研机构管理制度和职称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,一些科技人员开始走出院所和高校的“围墙”。

同样在1982年,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对《八年科技规划》进行了调整,制定了《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项目》。这是

我国第一个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。该计划自1983年实施以来,在科技促进农业发展、传统工业技术更新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在科技向经济靠拢的过程中,有着强烈计划色彩的科技体制逐渐表现出不适应。比如,科研机构由政府直接控制,缺乏自主性;行政干预过多,不利于科研人员发挥主动性;科技研发以任务为导向,缺乏经济利益的激励等。

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顾淑林认为: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其实是个‘试错’的过程,在‘试错’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将指导后续的改革工作。”

改革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阶段

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,作为全面改革的一部分,科技体制改革随之被提上日程。

1985年3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正式颁布。这标志着,经过1978年以来的探索和酝酿之后,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阶段。

《决定》指明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,首当其冲的便是拨款制度的改革,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,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。比如,对技术开发类的科研机构,在三五年内逐步削减事业费,直至完全或基本上停拨;对基础类的科研机构,拨给一定的事业费,实行基金制,通过基金对项目给予支持等。

一项重要举措。1986年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》,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度正式诞生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曾撰文指出:“这是我国科研经费从‘计划分配’向‘竞争择优’过渡的一个里程碑。”

开放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点。“技术成果是不是商品,一度是有争议的。而这次改革,在政策和法律层面都承认了技术成果也是商品,提出建立按照价值规律有偿转让的机制。”柳卸林指出。

此项改革措施一出台就让技术市场异常火爆,当时的市场反应给柳卸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回忆道,一些地方纷纷盖起了技术交易市场大楼,看上去比当地科委的楼还要漂亮。

1992年,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,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。在这种形势下,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随之有所调整。1994年,当时的国家科委等联合发布了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,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意见》。

“新的改革方针被概括为‘稳住一头,放开一片’。一方面,稳定支持少部分的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;另一方面,大量放开、放活技术开发机构、社会公益机构、科技服务机构等。”柳卸林说道。

按照“稳住一头,放开一片”的要求,人员分流和结构调整被视作是体制改革突破的关键。在新形式下,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。

专家点评

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前进



柳卸林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

1978年以前,我国继承了苏联的科技发展体系。这一体系将企业科研、院所科研、高校科研、国防科研设定为相互独立的结构,以计划手段来推动科技项目的开展,推动技术转移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,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,这一体制的局限性日益显现。首先,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,科技与经济存在着“两张皮”的现象;其次,由于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,缺少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机制,不利于技术扩散;第三,在科研院所内,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过多,存在着“大锅饭”的现象,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的主动性与积极性。

1985年3月,《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正式颁布,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。《决定》提出全国主要科技力量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,为经济建设服务。从那时起,政府一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供给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。

通过对改革阶段的细分,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改革的主旋律不尽相同。1985年至1992年,是第一阶段。这一阶段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要落实“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,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”的战略指导方针(简称“面向、依靠”方针),主要政策走向是“放活科研机构、放活科技人员”。政策供给集中在拨款制度、技术市场、组织结构及人事制度等方面,鼓励研究、教育、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进行联合,提出了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5种发展方向。同时,政府支持和鼓励民营科技企业,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,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。

1992年至1994年,是第二阶段。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,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。在这一阶段,主要政策走向是按照“稳住一头、放开一片”的要求,分流科技人才,调整科研结构,推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。

总的来说,这两个阶段的科技体制改革确实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,促进了科技的产业化发展,使科技与经济“两张皮”的现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,但“稳住”和“放开”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。

比如,科研院所的活力仍然未被完全激发出来。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要“放活”研究所,使它在科技发展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。但在实施过程中,由于国家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,研究所的微观管理依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。

再如,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没有错,但由于缺乏经验,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使一个科研单位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,而且同时具有了多个发展目标和多种体制。于是,科研院所有了“一院两制”的提法,高校有了“教育、研究和产业”三条腿走路的口号。这样一来,科研的目标与市场是紧密相连了,但其他目标在一些单位却被淡化了。

事实上,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,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,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、社会力量的发挥、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职能定位、科技资源的使用和监督等,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而科技体制改革本身也是一个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过程,只有逐步解决好上述问题,我国的科技发展才会有一个更健康、稳定的基础。

“这一阶段的科技体制改革确实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,促进了科技的产业化发展,使科技与经济‘两张皮’的现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。”

大事记

1978年3月

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会上,邓小平同志指出,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,并提出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著名论断,打开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。

1985年3月

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阐明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必要性,提出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。

1986年2月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,旨在支持基础研究,坚持自由探索,发挥导向作用,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,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

1993年10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开始施行。

1994年6月

中国工程院在北京成立,是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、咨询性学术机构。



丁一林油画作品《科学的春天》(局部)